

癌症是可以征服的

用 唯 物 辩 证 法
指 导 医 疗 实 践



证法丛书

上海人民出版社

总中02239

自然辩证法丛书

一九七九年三月十七日

癌症是可以征服的

上海人民出版社

癌症是可以征服的
——用唯物辩证法指导医疗实践
本社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海峰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6.75 字数 140,000

1974年11月第1版 1974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50,000

统一书号：2171·62 定价：0.37元

出版说明

为了适应广大群众学习唯物辩证法的需要，我们编辑这套“自然辩证法丛书”。这套丛书，包括自然史话、科学史话、自然辩证法论文、在实践中学习与运用辩证法的经验总结、史料选注和科学家介绍等，将陆续分册出版。

《用唯物辩证法指导医疗实践》，主要是汇集本市医务工作者学习和运用唯物辩证法的经验和体会，其中多数曾在《自然辩证法》杂志、《解放日报》、《文汇报》上发表过，这次出版时，部分文章作了修改。一些未注明出处的，为本书组稿。

我们热忱地希望同志们对这套丛书的编辑出版工作提出意见。

一九七四年七月

目 录

- 癌症是可以征服的.....袁任平 (1)
- 癌症可知 癌症可治
- 肿瘤问题座谈会纪要..... (7)
- 银针也能攻癌症.....俞 云 (23)
- 谁说癌症不可治
- 十五年来普查普治子宫颈癌的初步体会
-上海市纺织工业局第一、二、三医院
.....上海第一医学院附属妇产科医院 (30)
- 癌症患者谈与癌症作斗争的体会..... (40)
- 在实践中探索低温冷冻治疗肿瘤的规律
-上海第二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冷冻小组 (52)
- 我们是怎样进行肢体肿瘤病段切除再植的
-上海第一医学院附属华山医院手外科
.....杨东岳 顾玉东 吴敏明 郑忆柳 (57)
- 针刺麻醉中的辩证法.....任康桐 (62)
- 开辟针麻手术的新领域
-上海第二医学院附属第三人民医院 (82)
- 在针刺麻醉下如何做好腹腔手术
- ...上海中医学院附属曙光医院 张光正 吴传德 (89)

针刺术的由来和发展

.....上海中医学院 宇 史 (94)

全角膜白斑盲人重见光明

.....上海铁路中心医院革命委员会 (99)
用唯物辩证法指导白内障的手术治疗

.....上海第二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眼科 (108)
不断揭示脑子开刀的“秘密”

.....上海第一医学院附属华山医院神经外科 (114)
叫突然停跳的心脏重新跳动

.....上海第一医学院附属中山医院 (125)
我们是怎样打开婴儿心脏禁区的

.....上海第二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小儿心血管组 (133)
我们是怎样革除腹部外科手术上“两管”、“一禁”的

.....上海市长宁区光华医院革命委员会 (140)
治好严重腰腿痛的启示

.....上海市静安区中心医院外科 (151)
无麻醉也能切除扁桃体

.....上海第二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

.....上海市长宁区中心医院 (159)
鼓膜修补的成活率是怎样提高的

.....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耳鼻喉科 (167)

当好医疗“侦察兵”

——谈如何学习唯物辩证法掌握化验工作的规律性

-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警备区
一〇九医院化验科 (172)
- X线诊断中的辩证法
-上海第一医学院附属中山医院 林 贵 (177)
- 揭开“红眼病”病因之谜
-上海市“红眼病”病原研究协作组 (184)
- 眼睛与用眼
- 谈青少年近视眼的防治
-上海市眼病皮肤病防治所 (191)
- 人体第一道防线的维护
- 谈谈皮肤病防治中的辩证法
-上海第一医学院附属华山医院皮肤科 (196)
- 坚持用唯物辩证法指导医疗实践
- 批判医学领域中的形而上学观点
-上海第一医学院革命大批判组 (200)
- 编后 (209)

癌症是可以征服的

袁任平

癌症究竟可知不可知？可治不可治？这是当前在对待癌症问题上两条思想路线斗争的焦点。国外某些资产阶级学者和报刊大肆宣扬癌症的病因是不可知的，患了癌症是不可治的。美国一家报纸断言：“今天的二亿人口中，将有五千万人患癌症，三千四百万人因此而死。”在苏修及一些资本主义国家里，也广泛流行着“恐癌症”。他们把癌症说得玄而又玄，仿佛癌症是被上帝派遣到大地上来毁灭人类的死亡之神。

事实究竟怎样呢？应当认真分析。从表面上看，近年来癌症死亡率占人类因疾病而死亡的比例，相对地说是上升了。但这是否意味着癌症是突然泛滥起来而又无法对付的呢？不。癌症并非最近才有。在我国、埃及和希腊的古籍中，都有关于癌症的记载。但那时候，还有许多对人类危害更为严重的疾病存在，于是癌症对人类的威胁就暂时地被掩盖下去了。从解放以来北京、上海等地的统计资料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解放初期，居民死亡率中最高的是急性传染病和结核病。后来，这些原来危害人民生命健康的疾病很快地被消灭或有效地控制住了。这样，六十年代后，癌症才上升到前列，成了常见病、多发病。在世界范围内，癌症死亡率也大体是从这时候才名列

前茅的。

癌症的危害突出了，这对人类同疾病作斗争来说不单单是坏事，也是好事。人类在同疾病作斗争的过程中，总是有些疾病从危害严重到不严重，而另一些疾病则因为别的危害严重的疾病少了，就显得严重起来。这正好说明人类战胜疾病的能力大大增强了，对疾病的认识和斗争深入了。十九世纪前，天花曾是流行甚广、死亡率很高的“不治之症”。有人形容当时的欧洲就好象一个天花病的大病院，每年至少要夺去一百五十万人的生命，谈虎色变，闻病心惊，天花在那时竟成了“死亡之神”的别名，远远要比现在癌症对人类的危害严重得多。然而，物极必反。某种疾病严重危害人类之日，就是它开始被人类征服之时。天花的猖獗流行，矛盾的激化，推动了矛盾的解决。这样，既动员了人们去对付它，又为人类认识和战胜天花提供了许多有利条件。我国宋代已知道用接种人痘的方法预防天花，十八世纪传入欧洲，十八世纪末叶又发明了牛痘接种法。从此，猖獗一时的天花逐步得以控制，终于被人类征服了。一灾刚平，一灾又起，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肺结核病的危害又尖锐起来，占不少国家或地区居民因病死亡率的首位。后来，在同肺结核病的反复斗争中，人们发明了卡介苗和链霉素等药物，使肺结核病从“不治之症”转化为易治之症。“矛盾不断出现，又不断解决，就是事物发展的辩证规律。”也是医学发展的辩证规律。有矛必有盾，一物胜一物。有天花必有牛痘；有肺结核必有卡介苗、链霉素。昨天的天花、霍乱、鼠疫、肺结核等猖獗一时的疾病都能一个个地被战胜，今天，癌症也一定能够被征服！

有人说，“连癌症的病因都不知道，怎么谈得上什么战胜

呢？”不对。人们对客观事物的认识，总是从不知到知，从知之不多到知之较多。况且，今天人们对癌症病因，并非毫无所知。人类在同癌症作斗争的过程中，特别是近一、二十年来，对癌症病因的认识正在不断深入，已经发现了不少物理的、化学的、生物的各种致癌因素，并且初步揭示出了癌变过程的某些内在特性，为进行防治提供了一定的科学依据。当然，癌症是一类病，不是一种病，其病因比天花、肺结核等疾病要复杂一些。同一原因可能引起不同癌症；同一癌症又可能由于不同原因所致。这种情况确实给认识癌症带来了一定困难，但决不能由此就形而上学地断言癌症病因不可知。一切客观事物都是可知的。在人们变革现实的实践中，“自在之物”总是会转化为“为我之物”的。

一定要先把病因弄得清清楚楚了才能着手治病吗？不是！天花就是先在实践中逐渐积累了一些预防的办法，然后才找到天花病毒的。知病必先治病，在治病中知病，这是普遍规律。搞清病因确实很重要。但是，癌症的病因只能在防治癌症的实践活动中寻找。离开医疗实践，离开同疾病的斗争，病因从何而知？“**我们的结论是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只能治中求知，以治促知。如要先知后治，不知就不治，那就是舍本逐末，颠倒认识和实践、知和行的关系，必然会堵塞认识真理的道路，滑到唯心论的先验论的泥坑中去，成为望“洋”兴叹、向癌而泣的懦夫懒汉。现在不是有这种人吗？他们对临床治疗和普查普治不感兴趣，对广大群众的发明创造和祖国医学的丰富遗产不理不睬，蹲在高楼深院，一头栽进纯病因的研究中去。他们弃治寻知，置病人而不顾，毕恭毕敬地在洋文献划定的圈子里打转转。对洋文

献里的话，尽管并不都经得起实践的检验，却偏要奉为金科玉律，不敢越雷池一步；对洋文献宣传的一些方法，尽管有的已为实践证明并不那么灵，却偏要当作法宝抱住不放，连别人碰它一下都要火冒三丈。这种贾桂思想不打掉，必然会象他们自己所哀叹的那样，何年何月才能找到病因？

因此，怎么对待癌症，这不只是个业务问题，首先是个路线问题。是为追名逐利呢，还是为人民造福？是依靠少数专家权威呢，还是依靠工农兵群众？是从书本上找呢，还是从实践中找？每前进一步，都存在着激烈斗争。宫颈癌、乳房癌、肺癌、绒癌等癌症，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前，治愈率都很低。可是现在呢？由于广大革命医务工作者，遵照毛主席关于卫生工作的一系列指示，坚持实行中西医相结合，深入工厂、农村，和工农群众一起，开展普查普治，已经研制出了一批效果较好的治癌药物和器械，治愈率大幅度提高，并且超过了国际先进水平，使许多洋文献判定无法治疗的癌症病人重新意气风发地战斗在革命生产岗位上。尤为令人兴奋的是，曾经被某些人视为不科学的中医中药和小小的银针，不但已在治癌中发挥了很好的作用，而且为我们认识癌症提出了一些有意义的新课题。比如，临床实践的事实不断证明：癌细胞和正常细胞都会发生转化，两者之间并没有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癌细胞能损害机体，机体内也有抗癌因素，充分调动人体内的抗癌因素，就有利于制服癌肿；同一部位的癌肿可能出于不同的原因并表现出不同的症状，不同部位的癌肿又可能出于同一原因并表现出类似症状；单纯地使用某一种手段，机械地“大砍大杀”，比各种方法有机地相互配合，根据整体观念进行治疗，效果要差得多。这一切，都是传统的某些医学理论说

不清楚的。这就向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某些关于癌症的传统理论是不是需要重新认识？看来是有必要的。我们应当以辩证唯物论为指导，认真总结实践经验，批判地对待传统医学观念，把我们的认识和治疗水平不断地推向前进。

可治了，有些人不信。他们硬要说“是癌治不好，治好不是癌”。他不信，那就由他去吧。但是这话从反面提醒我们：在攻克癌症的斗争中，必须认真开展革命大批判，肃清刘少奇、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批判反动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和形而上学世界观，批判对待祖国医学的民族虚无主义态度。不破不立。在批判斗争中前进，这是攻克癌症必须抓好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医疗卫生战线上必须抓好的一个重要问题。

自从社会分裂为对抗的阶级以来，疾病问题就不单单是生理病理现象，而且是社会现象。马克思曾经深刻地指出：“工人的肺结核和其他肺部疾病是资本生存的条件。”（《资本论》）剥削制度总是寄生在人民的疾苦之上的。今天，在那些号称科学技术发达、医疗水平高超的资本主义国家，不要说许多癌症患者得不到治疗，普查普治工作根本开展不起来。就是那些对劳动人民的危害比癌症更加严重、治疗却十分容易的常见病，也得不到应有的治疗。这难道是由于什么不可治吗？不。在资本主义世界中，引起成千上万人民死亡的主要原因，是万恶的资本主义制度。不彻底摧毁万恶的资本主义制度，广大劳动人民身上的癌症怎么能治愈呢？他们嘴上讲什么不可知、不可治，骨子里是要用“不可知”、“不可治”的所谓“癌症恐怖”来掩盖资本主义制度腐朽没落的本质，用“癌症危机”来转移革命人民的斗争视线。

“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癌症恐怖论终将连

同资本主义制度一起，被无产阶级革命的烈火烧成灰烬。癌症这个严重危害人类健康的可恶瘟神，也必将被人类扫地出门。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具有攻克癌症的最有利条件。只要我们认真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牢牢掌握辩证唯物论的哲学武器，努力坚持中西医结合，认真进行医疗实践和科学实验，注意总结广大群众的创造发明，充分发挥“一把草，一根针”的威力，敢于战斗，善于战斗，就一定能较快地闯出攻克癌症的新路，创造出中国统一的新医学、新药学！

（原载《自然辩证法》杂志一九七四年第二期）

癌症可知 癌症可治

——肿瘤问题座谈会纪要

《自然辩证法》杂志编者按：最近，本刊召开了第一次关于肿瘤问题的座谈会。到会的医生和科研人员，介绍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治疗和研究肿瘤的可喜进展。许多生动的事实说明，所谓癌症“不可知”、“不可治”的消极悲观论调，是没有根据的，是完全错误的。到会同志还对如何进一步开展肿瘤的普查、防治和基础理论研究提出了一些设想。大家认为，只要认真贯彻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努力用唯物辩证法武装自己的头脑，实行专业人员和群众相结合、预防和治疗相结合、理论研究和临床实践相结合，把中西医更好地结合起来，就一定能较快地把肿瘤这个“难”治之症变为易治之症。下面是部分同志的发言摘要。

许良中（上海市肿瘤防治研究协作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上海市的肿瘤研究和防治工作有了很大的发展。我们协作组是在一九七〇年成立的，参加协作的工厂、科研、临床、教学单位，已从原来一百多个增加到二百三十多个，研究专题也进

一步扩大。此外，还有许多单位的同志也在从事肿瘤问题的研究和医疗实践。全市现有肿瘤专业基础和临床研究人员九百二十多名，其中有些是从赤脚医生和工人医生队伍中推选出来的。从市级到区、县级的医院直到街道、公社医院，设立的肿瘤病床有一千三百余张。近几年来，普查普治的范围不断扩大。一九七三年，全市又广泛开展了肝、肺等八种主要癌症的普查，从一百六十九万五千九百多名普查对象中，及时发现了一些早期癌肿病人，为进行及时治疗，保护病人健康创造了有利条件。群众性防治活动也开展起来了，市区和郊区一些地方建立了防治网。现在治癌医疗器械也在发展，单是一九七三年本市就又搞出了八种新产品。由于领导重视，依靠群众，比较认真地抓了“三早”（早期发现、早期诊断、早期治疗），并在中西医结合方面有进展，疗效不断地提高。疗效以五年生存率来统计，宫颈癌达百分之九十五，乳癌达百分之六十六，鼻咽癌达百分之四十七点七。血癌、肝癌、肺癌和胃癌等所谓难以对付的癌症，疗效也都有显著提高。

肿瘤的病因虽然是多种多样的，但也不是不可知的。一九七三年，本市工矿致癌因子调查组通过大量的实验研究，初步找到了某种致癌因子，为预防工作提供了依据，对有关行业技术改造也起了促进作用。当然，致癌病因现在还没有完全弄清楚，治疗手段（药物、器械等）也需要不断提高。但是，几年来的事实在充分说明，只要认真贯彻预防为主的方针，做到早期发现、早期诊断、早期治疗，就能够不断提高疗效。现在，有些人由于受到资产阶级癌症恐怖论的影响，一听到肿瘤就摇头，很恐惧。这种悲观思想是完全不符合辩证唯物主义的。事实将会进一步证明，癌症是可以认识的，是能够征服的。

汤钊猷(上海第一医学院附属中山医院):我在肝癌临床实践中有这么个体会:要与癌症斗,首先要与“不可知”、“不可治”论斗。过去,肝癌发病情况曾经被认为是不可捉摸的。现在用甲胎蛋白进行测定,只要验一点血,就可能查出肝癌。目前,百分之七十左右的病人可以较早地诊断出来,其中不少是毫无症状感觉的病人。一九七三年,我们用脐静脉肝造影的方法,还能看出一部分无症状感觉的患者的癌发生在肝的哪一个部位。

现在,肝癌的治疗虽然比某些癌症困难一些,但也绝不是什么“不可治”的。上海市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肝癌病人一年生存率不到百分之九,到文化大革命后的一九七〇年,已经提高到百分之十五,近几年又有提高,这比某些号称医学发达的国家还略高一些。通过中西医综合治疗,不少病员的生存时间则延长得更多,不少人已恢复劳动能力,重返生产岗位。

治疗肝癌,实行中西医结合很重要。西医的化疗、照光以及手术等措施都有一定疗效,但是只偏重于癌肿本身的治疗。中医比较注意整个机体的调整,但对消灭肿瘤本身则不太突出。起初,我们在治疗中把中医和西医两个方面割裂开来了,西医攻,中医也攻,以至常常发生肝癌破裂,引起大量出血。后来,我们总结了经验教训,在中西医结合上讲究辨证施治,采用攻补兼施的方法。当西医用化疗攻时,中医则以补为主,予以配合;反之,中医攻补兼施或以攻为主时,西医就不宜同时大攻。这样辩证地进行中西医相互配合,收到较好的疗效。

形而上学认为事物是一成不变的,这种观点也影响了癌

肿治疗工作。在这方面我们走过一段弯路。开始，看到有些病人用照光的办法有效，我们就施行大剂量、大范围照光，结果，许多病人不适应，还损伤了肝。后来，我们采用局部照、半肝照，变大剂量为小剂量、短疗程为长疗程，并把它作为综合治疗的一个部分，同时注意提高整个机体的免疫能力，效果就较好。动手术，过去总认为规则性切除好，现在发现有的病人局部楔形切除后，有的也能活十几年。肝硬化的病人不大能耐受大范围规则性切除，而我们以前不区别具体情况，效果当然不好。用药也是这样，由于各人体质不同，一个较大的剂量用在某些人身上是行的，但盲目地把相同的剂量应用到不同的病人身上，就往往会造成有些病人的肿块缩小了，机体也严重地损伤了的不良后果。这些都说明，医务工作者要努力学习唯物辩证法，克服唯心论和形而上学。

朱学宏(上海第二医学院附属第三人民医院)：从我们治疗急性白血病的工作中，谈些情况和体会。

以前医学文献和教科书上都说，急性白血病患者生存期不超过六个月。有些人总是说血癌不象其他癌症可以开刀、照光，甚至说什么血癌是“癌中之癌”，最难对付。这是形而上学，是无所作为的悲观主义。其实，血癌虽然有不同于其他肿瘤的特殊性，但和任何事物一样，也有两重性，有好对付的一面：检查比其他癌症方便，化验一点血就可直接了解病情变化，掌握治疗过程；血癌对化疗，尤其对抑制核酸合成和细胞分裂的药物特别敏感，胜过其他固体肿瘤，因此用药也方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我们由于思想上没有好好解放，步子不大。这几年来进展较快，已摸索到一些治疗规律，疗效显著提高，现在急性淋巴细胞性白血病的缓解率可达到百分之九